

俄国教科书问题

俄罗斯的“新历史学家事件”：
缘起、社会反响及实质

刘显忠

【内容提要】近年来俄罗斯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事件频繁发生，2010年6月俄罗斯又出现了国家机构干预历史研究、把历史研究政治化的所谓的“新历史学家事件”或“教授事件”。该事件是2010年俄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引起了俄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究该事件的本质，在于当前俄罗斯执政当局中有很多人主张进一步非斯大林化，许多俄罗斯人还保留有苏联时期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它也是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争论在当今俄罗斯的延续。

【关键词】俄罗斯 “新历史学家事件” 莫斯科大学教授 教学参考资料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2) 03-0022-0006

近年来俄罗斯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事件频繁发生：2003年出现了因教育部取消多卢茨基（И.Долуцкий）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上的“教育部推荐”字样而引发的关于教科书问题的讨论；2007年又出现了因政府炮制的菲利波夫（А.В.Филиппов）教师参考书《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的出版而引发的关于如何看待苏联历史及如何编写教科书问题的争论；2009年5月15日，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Д.Медведев）签署了《关于成立直属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反企图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委员会》的第549号总统令，将对企图歪曲篡改俄罗斯历史和损害俄国家利益的行为加以制裁；2010年6月俄罗斯又出现了一件所谓的“新历史学家事件”，也称“教授事件”。本文试就“新历史学家事件”

的缘起、俄罗斯社会对其的反应及该事件的本质进行阐释。

一、“新历史学家事件”的缘起

2010年6月俄罗斯出现的“教授事件”之所以也被称为“新历史学家事件”，是相对于1929～1930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案件”，即“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案件”。当时普拉托诺夫和塔尔列被指控继承了“克柳切夫斯基的沙文主义”遗产，站到了莫斯科老板极其粗野的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立场上。而今年的“新历史学家事件”，主要是指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山大·巴尔先科夫（А.С.Барсенков）和亚历山大·弗多温（А.И.Вдовин）两人合写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

【作者简介】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917 ~ 2009年)》在俄各界所引起的热议。

2010年第4期的《电影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杂志刊登了Н.索科洛夫(Н.Соколов)和А.戈卢博夫斯基(А.Голубовский)的题为《现在人们在向中学历史教师教什么》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评了一部大众没有注意到的教科书。2010年6月21日,在自由主义风格的《新时代》周刊上,新闻记者卓娅·斯维托娃(З.Светова)发表了《独特的历史:一部作为排外教学参考资料的教科书》一文。文章的内容就是关于弗多温、巴尔先科夫的教学参考资料的。文中认为教学参考资料的作者就是要“证明斯大林正确”和“担忧犹太人威胁”。7月10日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新闻记者И.亚辛娜(И.Ясина)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消息,说11日上午11点伊拉·卡拉楚帕(И.Карацуба)和阿纳托利·戈卢博夫斯基(两人均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将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讲述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新出版的一本荒谬的20世纪俄国史教科书。该教科书在大学经典教育系列中出了第三版。而实际上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讲,该书是年轻战士的航标。菲利波夫的教科书也无法与之相比。“在大学教科书中第一次统计了国家权力机关、文化和教育领域中犹太人代表的比例。该书的作者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①

之后,该教学参考资料遭到了尼古拉·斯瓦尼泽(Н.Сванидзе)^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布罗德(А.С.Брод)^③及车臣的“权利保护者”的批评。斯瓦尼泽称该书是“极端主义的参考书”,“教授的内容不够宽容”,书中对车臣人在卫国战争中作用的介绍及众多“反犹章节”令他很愤怒。他把教科书寄给了车臣的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Р.Кадыров),并附信要求他关注教科书中有关战时车臣人的内容。9月1日,车臣总统手下的人权全权代表努尔吉·努哈日耶夫(Нурди Нухажиев)过问此事,他致信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就教学参考资料中63%的战争初期入伍的车臣男子违背誓言成了逃兵等内容提出质问,认为教科书中引用的资料,违犯了1991年4月26日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现行法律第4条,并威胁要向车臣共和国的司法机关起诉教科书的作者。9月3日,车臣人

的辩护律师穆拉德·阿拉乌季诺维奇·穆萨耶夫(М.А.Мусаев)在莫斯科大学与两位作者见面,威胁要在格罗兹尼对他们进行审判定罪,要把出版社搞垮。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两位教授向穆萨耶夫写了道歉信,承认“在写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 ~ 2009)》(莫斯科,2010年)时,使用了未经核实的数据(尤指63%在战争初期入伍的车臣男子违背誓言,成了逃兵)”,并要求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和新闻看点(Аспект Пресс)出版社,在修改完不准确的内容前,停止发行该教学参考资料。他们承认援引未经核实的数据侮辱了车臣人的感情,对此深表歉意。请求穆萨耶夫放弃向侦讯机关和司法机关起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该问题^④。当天,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С.П.Карпов)也致信穆萨耶夫,对他9月1日的询问作出了回复。他承认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 ~ 2009)》包含建立在没有经过核实的史料基础上的信息,认为该教学参考资料的观点属于作者的个人观点,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不同意参考资料作者的观点。卡尔波夫指出,该教学参考资料已停止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过程中使用,已责成20世纪祖国史教研室在近期的会议上详细审查该教学参考资料的内容,并对其作出评价。卡尔波夫在信中也对出现的问题表示了歉意,并希望通过非司法程序进行调解^⑤。

9月6日,根据俄罗斯联邦社会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Ф)民族关系和信仰自由委员会主席斯瓦尼泽的倡议,社会院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 ~ 2009)》。会议由斯瓦尼泽主持,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拉夫罗夫(В.М.Лавров)教授,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和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В.А.Тишков)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

① Новое дело историков, Москва, 2010, С.94.

②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成员、反篡改历史委员会成员、《时代的审判(Суд времени)》电视节目主持人。

③ 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成员、莫斯科人权局(Московское бюро по правам человека)局长。

④ <http://traditio.ru/wiki/%D0%A4%D0%B0%D0%B9%D0%BB:Vdo vin-and-Barsenkov%27s-Letter-to-Musaev.jpg>

⑤ <http://traditio.ru/wiki/%D0%A4%D0%B0%D0%B9%D0%BB:MGU-Department-of-History%27s-Letter-to-Musaev.jpg>

院士卡尔波夫教授，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库尔良茨基(И.А.Курляндский)等出席了会议。拉夫罗夫、社会院成员谢尔盖·里亚霍夫斯基(С.Ряховский)、季什科夫院士及莫斯科律师事务所总经理亨利·列兹尼克(Г.Резник)等人的发言都指出该教学参考资料存在排外性和反犹性。拉夫罗夫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了会议评论的基础。评论既包含基于事实层面上的批评，也有政治层面上的批评。

第一，认为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教学参考资料的重要章节的名称没有根据。比如，第三章名为“苏联的加速现代化：1928～1941”。评论认为当时并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术语。而且作者在教科书中也没有回答把消灭农民阶级、破坏农业生产及农村的精神道德传统的共产主义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现代化”的根据是什么。评论认为教学参考资料作者使用梅德韦杰夫总统使用的“现代化”术语评定斯大林的国内政策，试图赋予共产主义试验以合法性，同时以新斯大林主义的精神阉割俄罗斯联邦的现代化。

第二，从事实层面上对该教学参考资料的内容进行了评判。评论认为该参考资料包含严重的错误及对历史事件不应有的歪曲。书中使用了令人怀疑的资料和公然伪造的证据。比如该书作者援引了斯大林在1939年8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即将与德国签约的讲话，却忽视了苏德关系专家С.З.斯卢奇(С.З.Случ)证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文章^①。再如，书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这样一段话：“一些同志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国家的主要力量是伟大的大俄罗斯民族。一些犹太族的同志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拯救犹太族进行的。这些同志错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为拯救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为首的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实际上这段话不是来源于斯大林，而是来自文艺作品——弗拉基米尔·乌斯宾斯基(В.Успенский)的长篇小说《领袖的秘密谋士》(1996年)。还有就是关于苏维埃政权期间总共消灭了约20万神职人员的数字，毫无根据，根本没有这样的数字出处。

第三，是对书中观点的评论。这突出表现在对书中有关斯大林时期各种问题的提法的质疑。评论认为，书中根本没有“斯大林的罪行”的概念，斯大林的国家恐怖活动在教学参考资料中被彻底掩盖。与最近几年发表的大量根据文件写成的文章相

反，该书中苏联领袖的活动与镇压运动没有直接关联。独裁者每一次都一无所知。比如，写1936年任命血腥的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对任命他的动议。斯大林也没有参与秘密的政治恐怖行动。托洛茨基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奸细”所害。杀害著名的苏联文化活动家米霍埃尔斯，就是根据斯大林的违法的命令进行的，对此不断有历史文件公布，在教学参考资料中却简单地以“死亡”列出，没有指明死亡原因。书中说“根据1937年的审判被定罪的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及其他人后来死亡”，而对他们1939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在狱中被杀害避而不谈。另外，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参考资料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所造成的这几百万受冤屈的人也是构成绝非杜撰的‘第五纵队’的潜在力量”、农业集体化被说成是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完成等提法，也都受到了评论者的质疑^②。

在车臣人之后，俄罗斯犹太人联合会主席亚历山大·博罗达(А.М.Борода)也致信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维克托·萨多夫尼奇(В.Садовнич)，要求结束“反犹宣传”，解决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2009)》的作者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是否称职问题。他在信中说，这两位教师“对当代俄国史评价的民族主义的偏见立场引起了我们的不安和疑惑”。他特别批评了教学参考资料的作者提出的历史应当“从捍卫国家主体民族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立场”来书写的观点。

二、“新历史学家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响

联邦社会院对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书的做法，在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完全站在教学参考书作者一边。久加诺夫(Г.А.Зюганов)针对这一事件指出：“最近俄罗斯公民成了针对莫斯科大学教授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

^① Случ С.З. Речь Сталина, которой не было.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1. 按：当然，这一指责能否成立还很难说，因为2005年又有历史学家论证1939年8月19日斯大林的讲话存在的文章面世。См.: Не миф: речь Сталина 19 августа 1939 года. С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5. №.08.

^② 评论的原文见2010年9月15日的《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

(1917 ~ 2009年)》展开的肮脏的宣传运动的见证人。两位老实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已经出了第三版，却成了反动力量疯狂攻击的对象。事件的背后，是想要对他们就20世纪祖国历史的复杂事件的没有偏见的研究进行报复。俄罗斯联邦总统下辖的社会院的一些成员在挑拨者之列出现这个事实令人十分难过。这是试图对职业历史学者阶层施加纯行政压力。”^①

俄罗斯作家和历史学家发起了“停止对学者的可耻中伤！”的捍卫莫斯科大学教授权益的签名活动。在签名中可以看出，签名的职业历史学家很少，大多数签名者为作家^②，这可能与作者弗多温是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有关，也反映了作者在文学界的影响。这批学者在支持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呼吁书中指出：“看来，前不久在电视节目《时代的审判》中扮演审判员的斯瓦尼泽先生，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拥有惩罚和饶恕权力的真正的历史的缔造者。大概，正是因此，斯瓦尼泽先生及其战友坚信：历史——这不是争论的地方，而研究历史的学者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都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3条、第29条)保证他们这些学者以及俄罗斯全体公民享有的权利。而且，学者们还会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极端主义的指责。”“如果今天斯瓦尼泽先生的动议在权力机关或社会上得到支持，那么明天俄罗斯就不会有历史学了：任何学术争论都有变成无休止的司法讼争的危险，在那里历史真相将通过反诉弄清楚。此后就会是所有其他学科的毁灭。”科学和文化活动家认为对教学参考书作者的中伤特别危险，因为“那些人要将一系列的历史问题置于禁止之列，恫吓历史学界的努力”会造成新的、“伪民主”的伪造历史的危险^③。

职业历史学家大多数都同意拉夫罗夫对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资料所作的事实层面的评论，承认该书是一部很差的教学参考资料，但反对以非学术手段对学术的干预，反对试图垄断真理的做法。历史学家、“历史纪念”基金会(Фонд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会长亚历山大·久科夫(А.Р.Дюков)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同意评论的作者对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教学参考书从事实层面提出的意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部书是在无法容忍的极为低下的专业水平上完成的。”“我专门仔细阅读了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的

章节——关于战前、战时和战后时期。可以说，从学术观点来看这是一部极差的书，它是按70年代苏联保守的精神写就的。在参考书中‘委婉地’回避了令现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激动的题目：如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叛变附敌现象、苏联的外交政策等题目。……我对弗多温和巴尔先科夫的教学参考书没有好感。但是，这部书的严重问题应当成为学术群体讨论的对象，而不是按1937年的精神进行意识形态中伤。”久科夫认为，有关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的书似乎在破坏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现代化计划，破坏文明、民主和法制发展的论断，毫无道理和根据。“这一切让我感觉像是与专业批评毫无关系的政治告密。这种告密在20世纪的30~40年代十分盛行。如果拉夫罗夫和库尔良茨基两位先生真是斯大林体制的反对者，他们就不应当重复那个时代的不好的实践。”^④久科夫在另一处还指出，指控任何历史学家“以新斯大林主义的精神阉割俄罗斯联邦的现代化”，在我看来与指控“布哈林—托洛茨基两面派”是完全一致的。“中伤弗多温和巴尔先科夫的活动已经带有越来越令人反感的斯大林‘公开审判’的特点，只是带有相反的意识形态特征。”^⑤

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卡尔波夫的态度来看，他同意社会院会议提出的大多数论点，他本人也不同意这部教学参考资料的观点，也指出了该书中的一系列史实错误和资料引用上的不规范。他说在教研室的集体会议上教研室就对该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批评意见，其中包括社会院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但两位作者没有考虑教研室的批评意见，这是作者的个人立场，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无关。同时他还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巴尔先科夫—弗多温的书——这不是教科书，而是教学参考资料。

①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ЦК КПРФ: Остановить травл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http://kprf.ru/rus_soc/84570.html

② “Прекратите позорную травлю учё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историки выступили в защиту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МГУБ, <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324261.html>

③ Деятели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выступили в защиту русских историков, <http://avkrasn.ru/article-383.html>

④ Эксперт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дела историков”: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заговорила на язык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носов”, <http://www.regnum.ru/news/1325683.html#ixzz0zblQza00>; “Дело профессоров-экстремистов”: научный не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проти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равли, <http://varjag-2007.livejournal.com/1992865.html>

⑤ <http://a-dyukov.livejournal.com/793185.html>

教科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供批判使用的材料，这里不要求规范，更不需要标准尺度。任何书，其中包括有偏见的和有争议的书都可以成为教学参考资料。”但他反对把学术争论政治化的方式。他在9月11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对巴尔先科夫—弗多温的教学参考资料的讨论，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是按学术争论的规则进行，而是按政论和政治评价的路径进行。专家的评价是必不可少的，要弄清楚真正的错误和没经过可靠史料验证的观点。有成见的、不宽容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需要有认真的学术专家的评审及专业人员的讨论。”他强调：“争论（特别是民族关系问题方面的争论）应当进行，首先要在学术圈内进行，因为，一旦讨论具有尖锐的政治性，我们就会激起民族仇视，并援引极端的论据，使争论升温。”与弗多温和巴尔先科夫主张历史是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应多写正面的内容不同，卡尔波夫认为：“无疑，历史是应当用来进行教育的，当历史事实很糟糕或很丢脸时，应当如何对待历史事实？要知道，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时刻！应当做出与整个历史背景相符合的解释。我同意社会院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历史学家的立场应当像医生的立场一样——不要造成伤害！”他主张“历史的消极面也不应当隐瞒，必须公布阐释它们的材料并在总的历史背景下阐释它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书写惨痛事实的人，不是怀着嘲弄的心情在写，而是满怀痛苦在写。应当善于准确地阐释民族性格某些特点形成的条件和原因，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卡尔波夫表示，他不会把亚历山大·弗多温和亚历山大·巴尔先科夫两位教授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开除。“不应当制造任何新的‘历史学家案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①

当然，支持斯瓦尼泽、主张禁止该书的声音也有。如有人指出：“这部教学参考书不单是歪曲了真相，而且以自己的排外倾向违犯了禁止宣传仇恨和挑起民族间纠纷的现行宪法和刑法。我们这里有相当多的人（我不准备称他们为公民）同情种族分子，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信仰者，而这种体制的罪行在我们这里直到现在也没有以应有的方式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定罪。我们没有对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的纽伦堡审判。

在德国，那里根本就不可能出版这样的教科书。我认为，应当禁止违反法律和宪法，这就是说，应当禁止出版这种著作。”^②

三、“新历史学家事件”的本质

就本质而言，俄罗斯的“新历史学家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俄罗斯新斯大林主义思潮和反斯大林主义思潮较量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历史观念上的分歧^③在史学领域的一个具体反映。从“新历史学家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从作为政府设立的监察机构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成员、反篡改历史委员会成员的斯瓦尼泽组织社会院成员及相关专家对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两位教授有亲斯大林倾向的教学参考书进行评论的举动可以看出，目前的执政当局中有很多人并不喜欢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主张进一步非斯大林化的。

其次，从“新历史学家事件”可以看出，苏联虽解体20年了，但很多俄罗斯人还没有完全走出苏联时代，人还是苏联时期的人，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苏联时代的观念，行为方式还有旧时代的痕迹。用闻一教授的话说：“普京和他的周围人毕竟都是在苏联时期接受高等教育并经历过那时的或苏共或共青团的生活的。尽管他们声称不喜欢回到过去、回到斯大林时代，但他们的行为准则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所接受的苏联时期的教育和经验的限制和制约，现在他们以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思考、衡量和决策着俄罗斯的一切事务。”^④这不仅在社会院对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两位教授的教科书的做法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巴尔先科夫和弗多温教授身上也有体现，两位教授为了弘扬爱国主义，尽力回避历史上确实发生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件，甚至把一些负面的东西解释成正面的，这是以论代史的写法，也不是真正的历史态度，有违历史研究的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пов, Никакого нового “дела историков” заводить не следует, http://www.rusline.ru/news_rl/2010/9/11/sergej_karpov_nikakogo_novogo_dela_istorikov_zavodit_ne_sleduet/

^② Об учебнике Вдовина-Барсенкова, <http://grani.ru/blogs/free/entries/181888.html>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下），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3～1494页。

^④ 闻一：《光荣与梦想——重读俄罗斯》，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本质。

再次，“新历史学家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争论在今天的延续。这在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像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祖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恩斯特·米哈伊洛维奇·夏金（Эрнст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гин）教授及该教研室的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伊万佐娃（Надежда Федоровна Иванцова）教授，巴尔先科夫教授，弗多温教授等，他们更接近斯拉夫派，他们主张历史研究应当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旨，应多写正面的东西，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学著作对负面的东西写得太多。实际上只写正面的东西也不是

真正历史的态度，容易挑起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情绪。而像皮霍亚、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如通讯院士、所长萨哈罗夫及祖布科娃等人，类似于俄国历史上的西方派，他们的研究涉及更多的是俄国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揭示自身的问题以自省。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俄国历史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二者对俄罗斯的不同定位。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斯拉夫主义者把她（俄罗斯——笔者注）当作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作孩子。”^①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8页。

Russia's "New Historian Event": Origins, Social Repercussion and Essence

LIU Xianzh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vents of historical matters took place frequently in Russia. In June 2010 occurred the event of Russia state organs interve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making historical studies politicized, which was called a "new historian event" or "professor event". This event wa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ussia's historical circle in 2010 and brought about different responses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nature of the event lay in the non-Stalinization advocated by the present Russian ruling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concept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in the Soviet time retained by many Russians. This was a continuity of th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Westernizers and Slavophiles which hav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new historian event; professor of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reference for teaching